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

邹志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复旦大学 政治学流动站,上海 200083)

[摘要]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国家之一,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土耳其经济优势和投资竞争力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产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很多合作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中土产能合作方式日益多样,但依然面临多种风险,特别是金融性与经营性风险较为突出。中国应根据比较优势与经济效益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产能合作实效,加强金融合作以破解融资难题、规避金融风险;创新产能合作方式,并注重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建设。

[关键词] 国际产能合作;土耳其;“一带一路”;国际投资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7)06-0131-09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产能合作的结合正在迸发出更大的经济效应。“一带一路”为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而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驱动力,并有助于支撑和提升“一带一路”的实施效果。国际产能合作着眼于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国际竞争力,塑造新型比较优势。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到了一个主观上必须转型、客观上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1]。国际产能合作通过再造以我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强化中国在“一带一路”价值链中的龙头地位^[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很大,“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开发与国际产能合作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深度融合,同时推动中国与合作国家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并确定了重点行业领域与优先合作伙伴,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指明了方向。之后逐步出现了国际产能合作的热潮,成为新时期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突出内容与亮点。国际产能合作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3]。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4]。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国家之一,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土耳其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首个海外客户,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正在逐步加强,国内企业对土耳其的投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中土产能与投资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处于前列。但也面临着—

[收稿日期] 2017-08-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6BGJ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地区经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16M601477);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新时期东亚与中东区域大国全方位合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QJTD14NS001)

[作者简介] 邹志强(1979—),男,河南汝南人,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中东经济问题研究。

系列十分突出的问题与风险,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中土产能与投资合作方式、机制与路径,推动土耳其成为中国产能与投资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一、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与机遇

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是基于生产要素、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通过伴随着资本、产品流动的跨国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国际优化配置,打造新的比较优势,延伸已有或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国际产业转移与产能合作与具体的产业领域、区位及政策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不仅在于产品生命周期、投资发展周期或边际产业扩张、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产业内在转移需求,也包括资源、区位、政策等多种因素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产业集聚和价值链的扩张或创新。

作为地跨欧亚的海陆枢纽国家与重要的新兴市场,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第一大经济体,是连接欧亚大陆与周边多个地区的重要枢纽与商品集散地,为全球重要的新兴投资市场与消费市场,拥有吸引外来投资的独特优势。新世纪以来,中土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高层互访不断,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快速推进为中土产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土产能合作的内在基础不仅在于产业、产品及技术本身的国际转移与延伸需求,也来自于区位、政策、市场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驱动,土耳其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地理位置、投资激励政策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一)土耳其的综合经济优势突出

1. 土耳其拥有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与实力。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发展成为世界第十八大经济体,多次被列入多种形式的新兴国家群体名单之中,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之虎”,“土耳其模式”也一度声名鹊起。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发展遭受一定挫折。2015年土耳其GDP为7179亿美元,人均GDP超过9261美元^[5]。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在中东、中亚、里海地区长期位居首位,现代化程度较高,产业部门较为齐全,综合经济实力最强。

2. 土耳其拥有全球独特的地缘经济优势。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地缘战略与经济区位优势明显,是中东、中亚、里海国家以及俄罗斯、欧盟的重要经济伙伴,靠近全球主要市场。特别是土耳其与欧盟签有关税同盟协定,通用欧洲产品与技术标准,凭借与欧洲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成为外界通往欧洲的中转通道,并与数十个国家签有自由贸易协定,是多个区域合作与贸易优惠安排的成员,成为世界投资与贸易往来的汇聚地。土耳其也是中亚里海地区、中东乃至非洲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国与投资来源国之一,具有较强的区域投资与开发实力。

3. 土耳其拥有较为成熟的国内基础设施、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劳动力与矿产、旅游等资源。截止2015年底,土耳其人口总数达到7874万,人均GDP超过92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92%以上^[6],国内消费能力强,市场广阔。人口总体结构年轻,31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劳动力资源丰富。土耳其拥有较为发达的铁路、公路、航运、航空基础设施,铁路里超过1万公里,公路超过23万公里,国内交通便捷,也是国际上重要的航空枢纽国家。过去的十余年,土耳其交通建设项目投资超过850亿美元,国内基础设施大幅改善。近年来又推出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中蕴含着广阔的投资机会。

4. 土耳其经济开放度高,致力于吸引外来投资,总体营商环境较好。正发党执政以来,通过私有化推动国内生产率与竞争力的提高;打造欧亚非地区的中高端产品生产基地与中转枢纽;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同时通过规范金融业、加强财政纪律、控制通货膨胀等措施保障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既极大地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也促进了金融与经济系统的稳定。土耳其多次推出投资优惠措施,国内营商环境较好,成为国际资本的热门流入地。2006年土耳其将投资鼓励计划写进法律,鼓励制造业、能源业与服务业的投资与出口。2012年土耳其颁布了新的投资激励计划,对在指定的落后地区投资以及大型项目投资给予更多的激励与优惠。土耳其外资规模不断上升,2015年吸引外资流量为

165.08 亿美元,境内外资存量达到 1454.71 亿美元,境内外资企业累计达 46756 家,外资来源地主要为欧盟国家,当年占到 66%^[7]。

(二)中土国际产能合作前景广阔

1. 中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奠定了基础。土耳其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两国政府都把发展双边经贸关系放在重要位置。2010 年中土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签署了多项协议,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并在 2012 年和 2015 年两次延长。从 2000 年至 2015 年,中土贸易额从 12 亿美元猛增到 215.65 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近 18 倍^{[8],[9]}。中国是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中土贸易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但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中土关系的重要基石。鉴于中土两国的经济规模及发展势头、经济互补性及双方的全球重要地位,中土经贸关系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两国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优势,拥有扩大经贸合作的强烈意愿,在投资与产能合作上大有可为。

2. 土耳其制定了宏大的经济发展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国内资金能力有限且遭遇资金外流压力的背景下特别期待中国投资。2011 年,土耳其提出了“2023 年百年愿景”,计划到 2023 年建国 100 周年时经济进入世界前十位,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对外贸易、教育、医疗、交通基础设施、制造业以及航空、旅游、农业等诸多方面设定了一系列具体目标,成为新的“土耳其梦”与土耳其重要的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10]。其中,计划新增基础设施与能源投资 2500 亿美元以上,拟新建 1775 公里高速公路和建成 2.5 万公里长的铁路网络,还推出了制造业升级计划以及推进国内通讯网络、智能电网发展的规划等。此外,土耳其利用自身区位优势推出并大力实施“中间走廊”战略。但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速与之前相比大幅下滑,国内储蓄率低和外资流入下降也削弱了其投资能力。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对外部投资资金的需求更为强烈,而已经崛起为全球投资大国的中国成为土耳其期待的重要投资来源地。

3.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及其与土耳其发展战略的对接为加强双方产能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宏观利益与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基础,国际产能合作必须结合中国与对象国的发展战略与规划^[11]。中国提出并加快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中土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双方加强投资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桥梁、天然合作伙伴和重要参与力量,中国需要与土耳其加大投资合作。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视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发起了旨在推动亚欧之间区域经济合作的“中间走廊”倡议,并希望将二者有效对接起来,酝酿多项对接的具体项目。2015 年 5 月,中土签署了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协议;2015 年 10 月,中国与土耳其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对接的谅解备忘录,为加强双边投资与经贸合作提供了指南与保障;2017 年 5 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再次表示,将积极参与和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4. 加大产能与投资合作是解决中土双边经济摩擦、实现经济共赢的有效途径。贸易失衡与摩擦一直是土方重要关切,中国扩大对土耳其的投资有利于解决中土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土耳其的欧亚市场桥梁作用,助力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入欧盟及周边市场。土耳其一直希望通过争取更多中国投资来平衡并增强双边经济关系,将本国推介为中国在欧洲和中东经商的大本营。扩大当地投资与生产经营无疑是改善贸易不平衡的重要途径^[12]。中土双方各具优势,中国拥有资金与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土耳其与中亚、中东等地联系更为紧密,合作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将大大增加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与成功率,也有利于通过合作减少疑虑与竞争。

二、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与风险

(一)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与特点

直接投资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载体,工程承包也是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均位居西亚非洲地区前列。2007 年中国对土耳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仅有 161 万美元,

2009年曾达到2.9亿美元,后来起伏波动较大,2012年为1亿美元,2013年为1.7亿美元,2014年为1亿美元,2015年达到6.28亿美元。中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1200万上升至2012年5亿美元,2015年达到13.29亿美元^[13](见表1)。2015年,中国在土耳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31.6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过13.39亿美元。2016年1~11月中国对土耳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到13.42亿美元,对土工程承包营业额达18.98亿美元,同比增长66.4%;截至11月底,累计合同额179.18亿美元,累计营业额123.71亿美元^[14]。中国企业对土耳其的投资热情不断提高,投资领域不断扩展,正从传统的矿业向农业、制造业、交通、能源、电信与金融等多领域拓展,并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通信、能源、矿产开发与轻纺制造等领域,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合作项目不断出现。近年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大了产能与装备制造、交通、核电、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力度。

表1 中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2007年~2015年)(单位:万美元)

近年来,中国在土耳其开展投资与工程建设的企业与项目日益增多,主要可以分为工程承包、制造业与服务业等三大类,产能合作的成功案例也不断涌现。华为公司、中兴通讯、中钢集团、中国通用技术、中国机械、中国铁建、中国航技、中国天辰工程、中国南车、中电光伏、哈电国际、奇瑞汽车等数十家知名企业均已进入土耳其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投资业绩,很多合作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成果(见表2)。

总体来看,中国与土耳其的投资产能合作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但数量依然有限,远未达到双方的投资潜力和期待。近年来中国在土耳其直接投资流量出现了大幅飞跃,中资企业投资的5000万以上的大型项目也不断出现,屡次打破投资记录,在土耳其投资的中资企业数量达到数百家。但相对来看,中国在土耳其投资的企业、项目数量与金额均不大,与在土耳其投资的欧洲企业相去甚远,也远未达到土耳其的潜力与期待。

二是合作领域大幅拓展,但投资项目依然较少,未能覆盖相关行业与产业链条。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电信、金融、交通、能源、采矿、制造、农业等领域,但总体上投资项目依然较少,高端制造业与高附加值产业不足,如在能源领域主要是投资传统的煤电厂和火电项目,对于土耳其计划大力发展的智能电网项目还有待拓展。

三是投资主体逐步增多,但依然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与少数知名民营企业上。由于土耳其投资门槛很高,中国知名企业在土投资设厂很少,而且也并非主要针对土耳其国内市场。中国对土耳其社会文化特点还不够熟悉,出口的大多是贴牌商品,国产品牌的辨识度不高,当地市场对中国产品形成价格便宜、档次低等刻板印象。

四是合作方式日益多样,但主要是以工程承包和通过收购方式实现的股权投资,兼以项目融资的形式参与其中,所占有的份额、利润均不高,整装出口很少,更有待向技术标准输出等高层次拓展。如安伊高铁二期项目中,中企只负责部分工程项目,带动中国设备出口十分有限。

五是合作风险依然突出,面临融资困难、互信度低、安全风险高以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中国企业在土耳其面临着较高的融资、政策与经营性风险,竞争压力巨大,此外还有政治、安全与文化差异及动荡带来的非经济风险。

(二)中土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主要风险

土耳其经济脆弱性突出,金融稳定性较差,加之近年来经济陷入失速状态,国内政治动荡加剧,安全环境有所恶化,中国企业在对土耳其投资经营中面临着政治、经济、安全以及政策等诸多风险,运营过程

中还面临着融资、汇率、法务、税务、签证、劳资等经营性风险。

表 2 中土产能合作的代表性案例

1. 土耳其国内宏观经济与经营、融资风险较为突出。从宏观经济风险来看,土耳其国内经济已遭遇增长瓶颈,增长速度下滑,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严重,金融风险加剧,汇率风险突出。2012 年~2016 年

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 2%~4% 之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一直维持高位;土耳其货币里拉不断贬值,成为最容易受到冲击的新兴国家货币之一,外债规模特别是短期外债水平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也纷纷下调了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未来展望。从经营与融资风险来看,土耳其国内企业经营成本不断提高,融资难的问题较为突出。土耳其对外商投资设置较高门槛,审批效率不高;物价水平偏高,加之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水电、天然气等资源价格较贵;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人力成本大幅上升;征收高额营业税,执行欧洲环保标准,因此综合投资成本较高。2016 年土耳其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 2010 年已经增长了 2.3~2.6 倍^[15]。更为重要的是融资难题,土耳其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国内储蓄率很低,投资能力有限,由于向当地银行融资的成本较高,土耳其政府采购项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绝大多数要求投标商提供融资安排。

2. 土耳其国内政治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自 2016 年 7 月的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格局经历重大变化而动荡加剧,日益增强的威权化倾向与严峻的安全形势使国内陷入持续的紧张状态,存在政局动荡隐患。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已受到压制但并没有根本解决,而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包容性日益降低,政治变革可能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和造成社会群体间裂痕的扩大,土耳其政府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压力空前增加。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2015 年末以来,土耳其国内的暴恐袭击呈现常态化趋势,土耳其民众的不安全感愈加强烈,土耳其的安全压力急剧增大。2014 年 8 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位于土耳其舍尔纳克省的火电站工地遭到武装分子袭击,3 名中国工人失踪,当年 10 月才安全获救。华为等中资企业也曾遭遇恐怖袭击威胁,不得不撤离部分人员。此外,安全威胁还包括“东突”分子与土耳其排华事件的冲击,如受到土耳其境内“东突”势力及外媒误导等因素影响,2015 年 7 月土耳其多地曾发生排华事件。

3. 大国博弈因素与地缘经济风险。土耳其与外部大国关系复杂,与西方之间既拥有多元深入的长期制度性联系,也面临日益扩大的嫌隙与矛盾;与俄罗斯之间既有长期的对抗性矛盾,也出现了日益密切的能源经贸联系与安全合作。传统上,欧盟及欧洲大国是土耳其的安全盟友,也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欧盟在土耳其拥有重大经济与战略利益。而俄罗斯也十分重视借助土耳其的地缘优势,作为油气向外输送的通道、与其他大国博弈及介入中东事务的杠杆等。但近年来土耳其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出现恶化或不稳定趋势,尤其是与最主要经济伙伴——欧盟的关系不断恶化,入盟进程停滞,恐影响土耳其未来的投资前景,削弱其竞争优势。由于难民危机的持续,欧盟对土耳其的不信任甚至是厌恶不断增强,土耳其入盟进程更是严重受挫^[16]。土欧关系的持续紧张与恶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双边经济关系及其投资环境,特别是对土耳其作为进入欧盟市场跳板的角色造成冲击。中土国际产能合作应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变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

4. 法律、劳工、文化等经营性风险,主要包括政策法律、市场调研、就业与工作许可、当地合作伙伴选择、文化与语言问题等。土耳其是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2016 年又大幅上升,同时中资企业在与土耳其合作中也多次出现被拖欠货款等情况。在劳动力政策方面,为保护当地就业,土耳其政府劳务输入控制很严,且手续繁杂、办理周期较长。外企需要按 1:5 比例招收国际和本地雇员,为本地雇员缴纳高额社保,同时办理工作签证周期长、费用高,且存在无法办理居留许可的风险。中资企业在办理工作签证和许可方面面临较大困难,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精力与财力。其他进口限制或海关管理措施也较多。如土耳其海关规定,出口至土耳其的货物,到港 45 天如无人提货,货物将被土耳其海关没收并进行拍卖,不经进口商同意,海关无权将货物退回发货地,已有大量中国出口商因该规定遭受惨痛损失。土耳其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成为影响中土产能合作的一大障碍^[17]。

三、中土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对策建议

只有在利益共享、战略对接的基础上,找准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互补优势,才能有效地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当前在加大与土耳其的产能合作过程中,中国应根据比较优势与经济效益原则有针对性地

选择优先合作领域、设定合作议程、推进合作项目,推动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与本土化生长;加大在绿色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合作与投资力度,促进工程承包合作,加强金融、技术合作以解决项目融资难题;大力开展在中东、非洲和中亚等第三方地区的合作,减少利益冲突,避免恶性竞争。

(一) 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选择

1. 重点选择能够充分利用土耳其的区位优势(特别是进入欧盟的优势)的相关合作领域,如纺织服装、电信、汽车、能源和光伏等行业。区位优势是土耳其投资吸引力的突出优势之一,特别是作为关税同盟成员可以自由进入欧盟市场,且地理上连接欧洲等地,产品交付更为便捷。欧盟作为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针对相关出口行业在土耳其投资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跳板,开拓欧盟及周边市场。如中电光伏2012年进入土耳其,利用土耳其的欧盟关税同盟成员地位,规避惩罚性关税,产品主要销往欧洲和北美。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在土耳其的投资布局及其覆盖欧洲等周边地区也充分利用了土耳其的这一优势。土耳其汽车产业具有人均汽车拥有量低、本土市场容量大、高技能劳动力以及邻近汽车出口市场等多重优势。在土耳其政府大力引进整车制造和本地化生产的推动下,大批国际汽车制造商在土设立工厂、开展技术合作,汽车业发展十分迅速,大有取代纺织业的龙头产业地位的趋势,汽车产业已连续十多年成为其最大出口产品。未来,中资汽车企业投资土耳其将大有可为。

2. 重点选择能够有效避免相同产业与企业竞争的相关合作领域,如纺织、家电、汽车等轻工制造与机械产业。同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与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相似度,竞争性特点突出。中土出口商品种类重合度高,纺织品及原料、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和运输设备等商品同排在两国出口商品前列,在欧洲、中东等地市场竞争激烈,也是引起经济摩擦的重点领域。土耳其国内相关产业基础设施较为成熟,本身市场容量也较大,具有投资优势。例如,土耳其纺织业技术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相关配套行业包括针织、色染、印花以及装饰等方面都很发达,是世界第五大纺织服装出口国。同时,纺织服装行业对土耳其来说地位举足轻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5%和工业总产值的17.5%,制造业产值的19%,约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20%,占出口总值的30%^[18]。因此,应重点选择此类能够有效避免激烈竞争的敏感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既可以有效利用土耳其国内较为成熟的产业基础及市场,也有利于降低双边经济摩擦。

3. 对接土耳其国内发展规划与需求,加强对土耳其基础设施与能源领域的投资。近年来,土耳其政府重点发展交通与能源行业,投资规模巨大,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新增基础设施与能源投资达2500亿美元以上。其中仅在能源领域就需要投资1200亿美元,包括建设大批煤热电站和水电站、新能源开发、新建核电站以及电力企业私有化和智能电网建设等。中资企业已经在土耳其能源与交通领域获得了日益增多的产能与投资合作项目,特别是电厂、高铁等领域。未来中国还应重视对土耳其铁路、公路、港口、能源、旅游、航天等领域的投资。

4. 通过产能合作努力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及技术标准走出去。凭借中国制造与中国技术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对土耳其的产能合作中应更加自信地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与技术标准的输出,加快制造业技术转移与产业对接,既回应土耳其打造区域制造业中心的构想,也借以形成中国优势产业在当地形成自发性生长与市场容量的扩展。新能源开发与高铁建设为中土两国领导人确定的两个合作重点,土方也希望在加快推进东西高铁、第三核电站等重大项目上与中国扩大合作。在航天等新兴领域,中土两国在航天卫星领域已经开展了相关合作,如2012年12月和2013年4月,中国就为土耳其发射了两颗卫星(GK-2, TURKSAT-3USAT)。

(二) 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路径、方式与风险防范

1.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中土产能合作实效,探索“创造性产业转移”^[19]模式。一方面,中土之间已经存在经贸联委会、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中土经贸论坛等合作交流机制,拥有相对顺畅的沟通交流渠道。未来还应强化现有政府间合作机制的经济促进功能,在制度上规范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健全各领域对话与合作渠道,更加注重政府、企业与第三方三层合作机制建设,特别是创设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双边机制及其与产能合作领域的有效对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以新型发展伙伴关系为原则的中土产能合作新路径。另一方面,根据土耳其的产能需求与合作能

力,推动相关产业在土耳其国内市场的立足、成长与发展及创新,形成有利于双方长远合作的产业、产能领域,通过形成产业基础与培育市场需求为今后的可持续合作奠定基础,建立有利于产业内生性生长扩散的创造性产业转移机制与新型经济合作模式。如电力行业、交通基础设施、电子、机械制造等。在此过程中,应坚持企业主体、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商业运作的原则,对接中国产能优势和土耳其需求,开展先进、适用、有效、有利于就业、绿色环保的产能合作,支持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产能合作效果与规模的良性循环,积极推进本土化和土耳其融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同时加快对接“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建设项目,如土耳其国内东西向高铁、跨海峡隧道、伊斯坦布尔新机场与港口建设,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功推进与连接贯通。

2. 综合运用多种产能合作方式并有意识地逐步升级优化。目前中国企业对土耳其的投资与产能合作还主要是以直接投资、工程承包及收购为主,兼有项目融资形式,还未能实现技术标准的系统输出与负责运营管理。土耳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普遍采用 BOT 建设—经营—转让或 PPP 方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运作十分成熟,但主要是欧美与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中资企业多以承揽 EPC 项目为主,基本还没能真正承揽和实施 BOT 或 PPP 项目。未来中土产能与投资合作应综合运用直接投资、工程承包、项目融资、技术标准输出、运营管理等 5 种方式,并逐步从直接投资与工程承包的初级形式向技术标准输出、运营管理等高端形式以及全过程参与的模式转变,通过直接投资、工程承包提供“捆绑式”服务,推动中国装备与技术、标准输出,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合作能力与市场地位,为长远发展与合作提供坚实基础。如包括电厂、输送、智能电网与电力设备产品等在内的电力行业,包括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技术标准、运营管理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行业等。此外,土耳其也是全球领先的工程承包大国,中土相关企业在土耳其及第三方市场开展强强合作的机遇广阔。

3. 深化金融合作为中土产能合作保驾护航,解决融资难困境、规避金融动荡风险。构建金融支撑体系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关键^[20]。金融与投资是中土经济合作急需加强的薄弱之处,也是双方领导人确定的新兴合作领域。一方面应加大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为国际产能合作保驾护航。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项目提供 2.03 亿里拉的贷款。另一方面中土签有货币互换协议,土耳其还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出资额为 26.09 亿美元,在 57 个创始成员国中居第 11 位。未来应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通过对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优惠贷款、出口信用担保等形式支持对外投资合作与装备技术走出去。在工程承包领域,对由承包商为业主提供资金的带资承包、需要承包商提供完工保函的融资、交钥匙工程、BOT 项目等提供融资,提升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参与竞争的资金保障优势。

4. 注重产能合作的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建设。结合近年来的双方市场数据对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投资与产能合作能力结构指数、能力结构耦合度进行量化分析,据此制作中土产能与投资需求图谱与合作能力图谱,得出较为量化的可参照数据,分析具体的产业合作机会与重点领域,使中土产能与投资合作建立在更为科学、有效的基础之上。中土产能与投资合作受到土耳其产业基础与政策、经营成本与效益、商业与法律氛围、政治与安全环境、市场容量、双边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加之近年来土耳其国内局势变化的冲击,对中国对土投资、工程承包与产能合作带来日益增大的风险。一方面,投资企业应事先全面了解土耳其投资与商业政策法律,做好市场调研,及时办理工作与居留许可,充分考虑汇率风险,选择本地企业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对外投资与产能合作原则基础上,重视发挥政府与驻外机构在风险防范方面的保驾护航作用,将国际规范的商业化运作与积极有为的经济外交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 [1]丁学东. 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国际产能合作[J]. 全球化,2015,(7):13.
- [2]吴福象,段巍.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J]. 中国社会科学,2017,(2):44.
- [3]John Ross.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 a New Stage of China’s Globalization[J]. China Today, 2016,(5):51.

- [4]中国商务部. 2016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EB/O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701/20170102504429.shtml>.
- [5][6]World bank. Country Data: Turkey[EB/OL].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turkey>.
- [7][18]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国别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土耳其(2016)[EB/OL].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upload/tuerqi.pdf>.
- [8]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0)[J]. 国际贸易, 2001, (2): 62.
- [9]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15)[J]. 国际贸易, 2016, (2): 70.
- [10]咎涛. 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J]. 西亚非洲, 2016, (2): 69.
- [11]沈铭辉, 张中元.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以中国—印尼合作为例[J]. 国际经济合作, 2017, (3): 6.
- [12]邹志强.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土经贸关系[J]. 回族研究, 2014, (2): 132.
- [13]中国商务部. 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42-48.
- [14]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 郁红阳大使出席 2016—2017 年度土耳其中资企业商会会员大会[EB/OL]. <http://www.fm-prc.gov.cn/ce/cetur/chn/xwtd/t1431200.htm>.
- [15]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EB/OL]. <http://www.turkstat.gov.tr/>.
- [16]邹志强. 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J]. 欧洲研究, 2017, (2): 50.
- [17]魏敏.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土耳其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与对策[J]. 国际经济合作, 2017, (5): 19.
- [19]钟飞腾.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 (8): 48.
- [20]谭璐. 搭建国际产能合作的金融支撑体系[J]. 中国经贸导刊, 2016, (6): 62.

Produc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 the Belt and the Road"

Zou Zhiqiang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re of Politic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Turkey is one of the key-joint nations of the " the Belt and the Road", and is a key partner for China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Turkey is prominent in terms of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the proposal of " the Belt and the Road" bring about new opportunity for Sino-Turkey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uccessful cases of Sino-Turkey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many cooperative projects have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 the Belt and the Road". The forms of this very cooperation become diversifi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kinds of risks, especially, comparatively prominent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risk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economic benefits, China should pertinently choose key fields for Sino-Turkey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actual effects of the cooperation with new partnership and progressive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 the Belt and the Road", and strengthen financial cooperation so as to solve financing problems and avoid financial risks. China should innovate the mode of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risk preca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guard mechanis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production capacity; Turkey; "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责任编辑 马 倩 责任校对 包宝泉)